



真语文书系 · 钩沉卷

# 民国国文教学研究文丛

论争卷

国文教学重要问题之论争

饶杰腾 编著



语文出版社

# 民国国文教学研究文丛

MINGUO GUOWEN JIAOXUE YANJIU WENCONG

论争卷 国文教学重要问题之论争

饶杰腾 编著

 国文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国文教学研究文丛. 论争卷: 1912~1949 / 饶杰腾编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87-0202-2

I. ①民… II. ①饶… III. ①汉语—教学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2558号

---

项目统筹 陈 鹏 李世江  
策划编辑 梦 阳  
责任编辑 张家智 张 兰  
装帧设计 郑 毅 梁 明  
出 版  语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wywp@163.com  
排 版 北京阅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 格 787mm × 1092mm  
开 本 1 / 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50.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

# 国家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 项目成果·真语文系列丛书

总 策 划 王旭明

丛书顾问 柳 斌 孙绍振 饶杰腾  
钱梦龙 贾志敏 吴桐桢

丛书编委 黄厚江 余映潮 胡明道  
李白坚 张赛琴 吴忠豪  
王士荣 周 宏

丛书主编 王旭明

执行主编 李世江

---

## 相似相续 非断非常

——写在前面

世纪之交，教育领域又开始了新一轮国家范围的课程改革。怎样改革才是有效的，可持续的，这是广大教育工作者至为关注的问题。

其实就语文学科讲，自20世纪初，国文独立设科以来，国文教育工作者，不管处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即使战火纷飞的年代，也从没有停止过实践与探索。他们所贡献的——或经验，或教训都弥足珍贵。这笔财富，我们不应漠视它，舍弃它。为了总结我国国文教育的历史经验，我陆续浏览了20世纪前期与国文教育相关的资料，边阅读，边发掘，边鉴别，边梳理，选取其中一些文章，按主题编撰，终成了这几个小册子。

梁漱溟先生认为，“相似相续，非断非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在《晚年口述》中说：“‘相似相续’，它是连续的，相似就是了，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很相似，已经不同了，只是相似。严格地讲，前一个时间的我跟现在时间的我已经不同了，一个人从一个小孩长大，像我八十多岁，时时刻刻在变化，时时刻刻在不同。这个不同一方面简单地讲，他自己身体就不同了嘛，头脑就不同了，外面给

他的影响也早已不同了，所以都是在不同之中，但不同之中也有一定的相似，所以叫‘相似相续’。‘非断非常’，‘非常’，就是不是常恒如故，中国人本来是‘常’，跟‘恒’连着的，也可以说‘恒常’，也可以说‘常恒’。‘非断非常’，不是常恒的，可又不断，‘非常’就是现在的我跟刚才的我不是一回事了，可是也没有断，仍然还是相续的。”<sup>①</sup>

费孝通先生更把“事物”看作是不同的时间上变化的集合体。他在《暮年自述》中也说：“从‘今天’是可以推测‘昨天’的，因为历史并没有‘走’，它还包含在‘现在’里。人们一般不去关心这个时间概念——我们说昨天已经过去了，如果仔细想想，你会觉得‘昨天’并没有走，今天有昨天的‘成分’在；就像昨天的‘我’还留在今天的‘我’里。可是今天的‘我’已经有了变化，又不同于昨天的‘我’了。”<sup>②</sup>

季羨林先生又认为，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他在《自述》中说：“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必有其优异之处，可传之处，否则早已被淘汰掉了。现在有一些先生总是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我认为，与其说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为什么不能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矣’呢？破立次序之差，表现了人们对批判与继承的看法。我绝不是说，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东西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虽然破立必须结合，不能不结合；但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而不仅仅是破，不仅仅是批判。”<sup>③</sup>

本着以上三位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也应当把“语文教育”看

①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第246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② 《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第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学问人生——季羨林自述》第154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

作“不同时间上变化的集合体”，其变化是循着“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的轨迹，其改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反观百余年来的我国语文教育，“改革”也好，“革命”也罢，几乎从未停歇，但收效却不尽如人意。这就牵涉到能否认真对待批判与继承的问题。

为此，十年来，我反复翻阅 20 世纪前期相关的国内中文期刊。在教育方面，有清末宣统元年（1909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民国元年（1912 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五四运动当年（1919 年）由新教育共进社创办的《新教育》，以及由蔡元培先生为创刊号（1935 年）作序的南京《教与学月刊》。这些期刊，大多产生于历史的关键阶段，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们或以“研究教育、改革学务”为宗旨，或意在广泛探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政策、教育设施和教学方法等，对欧美教育思想及实践也有不少介绍。

综合性刊物有 1930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创办的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月刊《中学生》。以向中学生提供多种趣味与知识，解答疑问，指导前途为宗旨。虽为多科性杂志，但它对国文教学尤为重视。特别是前期在夏丏尊先生的主持下，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至于专科型刊物，则有被誉为国文教学研究“双璧”的 40 年代创刊的《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桂林），前者偏于“教”，后者重在“学”。其影响所及，以至于今。

我阅读上述文献资料的过程，也是与新的课程改革相互比较、碰撞、互补、汲取、提炼的过程。在我的案头，同时放有世纪之交课改以来的《语文建设》《中学语文》《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等杂志，以及《语文学习》《课程·教材·教法》的相关复印件，它们是我长期跟踪新一轮语文课改的理

念与实践的资料，我从中整理出若干思路，作为丛书选文的参照。

于是，就将本丛书分为“总论”“论争”“阅读”“写作”“选读”等五册。“总论”和“论争”部分系概述，“阅读”和“写作”部分为分述，而“选读”部分则服务于“读、写”。五册书，合则为一整体，分则相对自成系统。

“总论”的要点：

新的国文课程是为培养善于运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对现代生活的普通公民服务的。作为一国的国民，对本国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达到最基本的水准。对国文课程的性质、目的的认识与课程的内容和方法的选择是紧密相关的。回顾自“五四”运动前夕到40年代末，国文课程革新的重心和发展的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益。

“论争”的要点：

一是有关二三十年代国文课程标准的讨论。20年代新学制课程标准的讨论带有纲领性、结构性，因而富有建设性，为以后课程标准的构建和改造打下基础。二是30年代前期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和40年代初关于“抢救国文”的讨论，其实质是关于“文白”之争。这时期的论争，为我们揭示了相对正确的思维方式方法。

“阅读”的要点：

阅读教学在国文学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阅读教学要放在国文学科中作通盘思考；阅读与阅读教学的内在联系；教师的一般指导与学生个性化阅读的密切关系；阅读教学过程中“获得思想”与“运用工具”的有机结合；默读与朗读相辅相成；要注意中小学不同阶段阅读教学的特点。

“写作”的要点：

文章的标准第一是要真，真是善和美的基础；国文学科写作教

学遵循“习作”而不是“创作”的原则，旨在养成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训练思想、培育思想和注重技术、发展技术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个体”与“集体”的互动作用；从指导和习作关系的变化区分不同学段的内涵。

“选读”的要点：

作品既包括“诗文”又涵盖“古今”；理论指导与阅读体验的关系；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鉴赏的关系；选本选编原则与教学的关系；语体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思路的异同；范文阅读与写作教学的结合。

当我们接触以上各册中的宝贵史料时，研读、理解、体验、消化、吸收，应力求贯彻顾准先生系统阐明的“科学精神”，即“①承认人对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②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③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④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个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C，可以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⑤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批倒。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是水火不相容，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sup>①</sup>

语文课程的实施与研究就是科学，必须本着科学的态度，体现

① 《顾准文集》第344~34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科学的精神，选用科学的方法。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上世纪的前半叶，怎样科学地解决“为什么学”的问题，是课程的根本性问题，因为“学什么”“怎样学”是由“为什么学”衍生出来的。我们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为此作了深入与广泛的科学研究。当时《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周予同在编制国文课程标准之前，就提出我国的中学校不能当成狭义的职业学校，又不能与大学文科相混。我们的中学生，在学问上是预备升学，在社会上要使之成为“完全的人”。为此，周氏拟得的国文理想目标，应是“人人能用国语或浅近文言，自由而敏捷地发表思想感情，或纪述事实”；“人人能懂得中国文学和学术的大概”。而1932年所拟定的《国语课程纲要》提出，要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能看平易的古书，养成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这一表述与周氏见解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它的片面性。1929年部颁的《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转而1932年正式颁行，1940年又加以调整与修正。两年后，叶圣陶又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一文中，有重点地作了商榷。如“了解固有文化”，就国文课程而言，文学名著是其中的一部分，要加以了解，要使学生解读它，欣赏它，对“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做了具体明确的解读。再如关于“语体”问题，叶圣陶指出，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这就从一般到特殊区分了国文科的目的，科学地确定了课程的特殊性。再过两年，著有《中学国文的道路》一书李广田经过详细全面比较之后，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一文中说：“我看部定标准经多年来一再修整，实在说，为了改进中学国文程度，还不如民国元年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更适用些，那一条是：‘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李广田对“那一条”作了当时力所能及的解释：首先“通读”是中学国文教学的主要目标，然后再把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分为“普通语言文字”和“高深文字”两层，即“白话”和“文言”。其要求是“通解”和“略解”。所读所写都是白话，不仅要“通解”，而且使年青人也能借此以“自由”发表思想（表现感情在内）；高深文字，说的是文言文，而且是近代的、平易的，只求“略解”。中学国文应以“涵养文学趣味”为主，兼以启发智德，指的是寓“智德”于文学之中。

从以上周予同对《新制国文课程》的合理预测，叶圣陶对此后一再修订的《国文课程标准》的深入剖析，以及李广田在与民国元年校令第三条的比较解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断探求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当然，历史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的。以往的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同时代的局限性，但我们要探讨的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我们都“扬”了什么，“弃”了什么——保存了哪些，又更新了哪些；增添了多少，又剔除了多少。无论是保存、更新，还是增添、剔除，其理由又是什么。这些必须要科学地思索和考量，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我们今后的试验和探索中一步一步更加稳健地逼近（而不是背离）语文课程自身发展规律，逐渐改变百余年来语文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的局面。

最后，我还要补上一笔：10年来，在浏览、收集、挑选、编撰中，时时刻刻受到感动与震撼的，有当时的语文教师、研究专家，也有杂志编辑乃至印行人员。读者朋友们，尤其当你读到1945年4月20日发行的《国文杂志（桂林）》的“启事”时，我想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一期的本志，上年九月初已经在桂林印好，准备发行了。那时敌人逼近桂境，桂林紧急疏散，本志全数放在桂林北站，预备起

运，到贵阳或重庆去寄发，但敌人来得太快，竟未能运出。现在将原有纸型浇版重印。此后本志在重庆继续发行，并且要尽一切的努力，使它不致常常脱期。本志同人在这次湘桂和黔南的战役中，仓皇撤退，千里跋涉，艰苦备尝，现在还能够重整旗鼓和读者见面，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希望读者诸君，多多给我们以支持和鼓励，并祝诸君健康、进步。”

是的，语文界的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珍贵的资料，宝贵的经验，科学的态度，还留给我们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将滋养我们，使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健康前行。

饶杰腾

2015年初春

## 编者的话

这套《民国国文教学研究文丛》选编的论文起自1912年，截止1949年，这段时间正是白话文兴起、现代汉语使用标准逐渐确立的时期。这些文章因此具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语用特征，如文白混杂、文字使用不统一、语法运用规范不一致等等。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使用这套书，我们觉得应该对原稿进行一定程度的编辑加工。经过反复交流、商量，我们确定了一个总的编辑原则：在尽可能保留原作样貌的基础上，对原稿的文字、体例进行最小程度的修订。现将具体做法说明如下：

一、繁体改为简体。

二、对一些字、词作了修改，列表如下：

| 原稿           | 编后 | 原稿 | 编后 |
|--------------|----|----|----|
| 底（相当于“的”的用法） | 的  | 其它 | 其他 |
| 的（相当于“地”的用法） | 地  | 那末 | 那么 |
| 的（相当于“得”的用法） | 得  | 惟一 | 唯一 |
| 那（作“哪”用）     | 哪  | 想象 | 想像 |
| 他（作“它”用）     | 它  | 印像 | 印象 |
| 沈（作“沉”用）     | 沉  | 好象 | 好像 |
| 竟（作“竞”用）     | 竟  | 胡涂 | 糊涂 |
| 化（作“花”用）     | 花  | 未偿 | 未尝 |
|              |    | 部份 | 部分 |
|              |    | 正谊 | 正义 |
|              |    | 剿袭 | 抄袭 |

三、原稿中不少字、词的用法虽然与现行的用法标准不尽相同，但为了尽量保持原有的样貌，不作调整。这样的情形很难穷举，现将部分字、词列举如下（括号中是现在通行的用法）：

做（作）、辞（词）、于（与）、联（连）、决（绝）、订（定）、藉（借）、见（现）、罢（吧）、缴（交）、较（比）、与（予）、迭（叠）、只（止）、须（需）、目（视）、二（两）

联络（联系）、透澈（透彻）、教课书（教科书）、甚么（什么）、人材（人才）、年青（年轻）

四、原稿中外文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均保留原译。

五、原稿中的标题体例除了其自身不统一外，基本保留。

六、原稿中数字、标点符号的用法，按照现在的出版标准作了修订。

七、对原稿中的错误（如错字、漏字等）进行了修订。

这些做法，算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探索，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

2015 年春

## 内容提要

本卷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国文课程标准的讨论，选入8篇文章；二是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以及关于“抢救国文”的讨论，选入8组共37篇文章。两次讨论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讨论的基本情况。

第一，严格意义上的课程标准是在1923年由当时全国教育联合会下属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讨论制订的，内容比以前完整、具体，较鲜明地体现时代精神。讨论的意见，以那时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周予同为代表。

为组织课程标准讨论，周予同于1920年10月24日、1921年4月25日相继撰写《对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新制的国文课程》等纲要性文章，就理念、目标与原则作了全面、扼要的论述。他认为“中学校是普通教育，是大学或专门教育的预备；不是狭义的职业学校，也不是大学的文科。中学生在学问上，是预备升学的；在社会上是养成一个完全的人”。相应地，他拟定了国文理想标准，除“人人能用国语或浅近的文言，自由而敏捷地发表思想情感或纪述事实”外，还要“懂得中国文学和学术变迁的大概”，得到应有的涵养。在阅读教学实施方面，“主张看书和讲读都不可偏废。看书偏重于学生自修方面；讲读偏重教师指导方面。只有看书，流弊或则至于‘食古不化’；只有讲读，流弊不免至于学识浅薄。为

调剂二者的缺点，应该双方并进才是”。“学生自修”“教师指导”并进可视为阅读教学的一个原则。

1929年，普通教育一律改为普通科制，因此各科课程标准也作了相应的修订。此前，国民政府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决定重新编订各科课程标准。1929年8月，颁布了各科的“暂行”标准。这是以政府教育部名义颁行的具有教育法规性质的第一套课程标准。其中语文一科，小学部分由吴研因、赵欲仁等人编订；初中部分由孟宪承、刘大白编订；高中部分则由孟宪承、胡适等人编订。

其后，课程标准暂行又修正，再由修正而修订。在讨论过程中，贡献的意见以叶圣陶为多。他指出，我国有课程标准，从民国十一年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开始。以后历次修订，内容和间架都和第一次颁布相差不远，没有全新的改造。他又颇有感触地说：“关于国文教学，我曾经发表了一些意见。那些意见大致都依据国文课程标准出发。就是说，在国文课程标准的范围之内，我以为国文该怎么教学。其实也不妨超出这个范围来想一想，超出这个范围，才可以发现某些部分还得修订，甚而至于整个须得改造。”

此外，当时阮真与汪懋祖的论争也产生不小的影响。汪懋祖以为，阮真之法“似在顺其流而疏导之”，自己则“欲正其本以清理之”，而“正本”之计，“宜多选读熟读平易清浅之文言文”。对此，阮真在复函中指出，应“均根据学生心理程度需要与教学效率立言”，“主张中学国文教学应以小学程度为最低出发点，不能根据文学国学之教材标准，远离实际，而以大学课程为最高出发点”。这是讨论的核心所在。他十分中肯地表明：“国文教学涉及整个教育，于今日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学环境、学生程度均须顾及，不能专就国文而言国文，更不能专就国学而言国文。”

第二，30年代前期，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问题曾经展开过

讨论。对于国文程度低落与否，叶苍岑认为，“有两个问题必须先为解答：第一，一般人所谓‘低落’，是拿什么做标准的？第二，中学国文科的学习目的是些什么？”

“先谈第一个问题。一般人所谓‘低落’的标准，可能有二：一、是以过去的中学生做标准，这就是说，目前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比不上过去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意思；二、是以‘部颁中学生的国文课程标准’做标准，这就是说，目前中学生国文程度达不到‘部颁中学国文教学标准’所定的高度的意思。据我个人观察，一般人谈这个问题所有的标准，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现在抑或过去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一般的说来，都是达不到当时课程标准（我国标准已经修订过几次了）所定的高度的；换句话说，就是假使以‘课程标准’做标准，过去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也不能不说是低落的，怎能独怪现在的中学生呢？我们仔细考察一般人的意见，也决不是如此。”

至于第二个问题，就中学国文科的学习目的来衡量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可以得出结论：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并不是全部低落，只是一部分低落了；这一部分是限于文言方面，尤其是在古代文言方面。

具体说来，1934年底，《中学生》杂志第49期，发表了浙江六中国文教师尤墨君的《你们能写出些什么？》，相应地，在“卷头语”刊载了短文《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吗？》，由此引发了这一场讨论。

“究竟低落到什么情形？从前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怎样，现在又怎样？低落的现象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其原因又何在？对于这些，似乎还少有人做过精密的研究，给过仔细の説明。”

本卷全部收入《中学生》杂志讨论的文字和编者的态度和看法。